

## 《儒林外史》地域叙事的圈层结构及相关问题考述\*

史俊超<sup>1,2</sup>

(1. 南京大学文学院, 江苏南京 210023;  
2.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 江苏南京 211200)

**[摘要]** 《儒林外史》的时空叙事是其重要特点,就空间而言各大地域叙事有严密的圈层结构。在各大板块内部,从外围到中心的叙事趋势逐渐加强,但又并非单向的线性集中。这种趋势在进入南直隶板块后表现得更加明显,呈现出聚焦-离散-再聚焦的回旋模式。之所以形成这种模式,从文化地理的角度来看是因为南京的双重政治文化身份以及作者对其地域偏爱,造就了南京的双重文化中心地位。而从更深层次的表达机制可以看出作者对于“礼乐兵农”主旨的描述需要如此广阔的地域空间作为舞台,对南北文化的态度和吴敬梓本人的经历也注定要将焦点放在南京。除空间的地域圈层结构外,时间叙事与空间叙事的高度耦合也说明了《儒林外史》五十六回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关键词]** 儒林外史; 圈层结构; 文学地理; 原貌

**[中图分类号]** I207.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0)01-0017-07

《儒林外史》作为一部具有广阔地域空间描写与长时段叙述并存的小说,其自身的叙事逻辑历来备受重视。近年来,从叙事学的角度研究《儒林外史》的时空叙事成果越来越多,大多数学者认为时空叙事是本书的一大特点。从时间上来讲,除第一回楔子外,书中明确交代时间的只有六处,即成化末年(虽未明言何年,但论者多以其下限,即成化二十三年视之)、嘉靖九年(1530年)、嘉靖十六年(1537年)、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和最后一回幽榜时的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另有宁王之乱虽未明言时间,但可知是在正德十四年(1520年)。虽时间交代不多,但可以通过主要人物的转换和回顾望其前后,往往在不经意间感受时间的流逝。相较时间而言,其空间叙事则甚是明了,随着主要人物而依次推进,每到一处必有交代。然其涉及地名颇多,研究者争论较多的是其空间叙事是否有内在逻辑。据笔

者统计,明朝的两京十三布政司中,除广西和云南从未言及外,全书涉及了其他所有省份。对于这些区域的前后出场是否为作者刻意安排,研究者有不同的看法。

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叶楚炎先生的《地域叙事视角下的〈儒林外史〉结构——兼论〈儒林外史〉的原貌问题》一文是近年来这一领域的代表作,此文从讨论《儒林外史》的地域叙事结构出发,附带研究了长期困扰学术界的《儒林外史》原貌问题,颇具启发性。但文中亦有一些可商榷之处,本文试图对该问题有所申论。

### 一、地方板块中的外围——中心趋势

山东是孔子故里,是儒家文化发祥地,作者将山东作为全书正文叙事的起点,其寓意是不言而喻的。在楔子中,王冕就曾逃难到济南府。“这山东虽是近北省份,这会城却也人物富庶,房屋稠密”<sup>[1]10</sup>,明为赞扬山东,实为暗讽其不如孔子之

\* [基金项目]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十三五”科研规划第一期重点项目“明清时期苏南文化地理研究”(项目编号: JSNU2016ZD05)。

[收稿日期] 2019-09-27

[作者简介] 史俊超,男,江苏溧阳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时,一个“近北省份”道出了作者的态度。正如杜贵晨先生所说,“汶上”曾经是孔子为政之地,选择此地作为原点,可将周孔时代的礼乐制度与小说时代对比,看出当时八股制度下礼乐的败坏。<sup>[2]</sup>但即便如此,全书仍多次提到山东,成为全书情节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如第三十六回中虞育德曾在第一次会试失败后山东待了两年多<sup>[1]446-447</sup>,庄绍光在进京往返途中曾两次路过山东,去时是兖州府,来时是台儿庄。<sup>[1]427,437</sup>虞育德和庄绍光二人是吴敬梓在书中极力褒扬之人,重点着墨他们在山东的经历,可见作者对山东这一儒学发源地有一种特殊的情感。

在山东板块叙事内部,虽然故事主要发生在汶上县薛家集,但是成为周进一生命运转折点的却是他跟姐夫金有余去省城济南,进贡院后撞晕,旁人可怜他,出资捐了监生,又中了举,而后再到京城考中进士。可以说省城济南虽不是描述的重点,但是无疑在仕宦生涯中有重要地位。

然后借周进钦点广东学道,叙事转入广东板块。广东板块的叙事重点在两个地方,一个是南海县,一个是高要县。范进是南海人,而南海县属于广州府,所以广州又成为范进叙事中的双重中心。范进第一次出场即是去广州应童子试,由于周进的赏识而成为秀才,又因其鼓励瞒着家人去考了乡试,这些都是在广州进行的。而后与张进斋一道去高要县打秋风,叙事的重心转移到严贡生与严监生兄弟。虽没有具体提到广州,但在此部分曾三次涉及广州,或因科举,或因诉讼。并且因严贡生在广州碰壁,而与范进一道进京去拜见周进作为广东叙事的结束。

至于为何选择广东作为叙事空间的第二个板块,大抵是因为山东在北方,而从空间对称性来说,必要择一南方省份与之相对应。广东在最南边,且明清以来经济发展迅速,清朝中期以后广州成为一口通商之地,经济地位重要,由此带来的科举的发展也可以想见,故作者选择此地与山东一南一北遥相呼应。文中周进与范进师生的仕宦经历也可以看出作者构思的巧妙,周进山东人士,而做广东学道。其门生广东人范进又做山东学道,这样的籍贯与宦所互换的写法,不得不说是作者刻意为之。

接着范进和严贡生去拜见周进,做了几年京官以后调任地方,任山东学政,又回到了山东叙事板块。这次重回山东,虽叙事不多,主要集中在第

七回,却引出三个极为重要的人物,分别是蘧景玉、牛布衣与陈和甫。这三人此时看似无关紧要,却为此后三个地域板块叙事奠定了基础。蘧景玉本人出场不多,仅因苏轼那个笑话引人关注,但因其父蘧太守和其子蘧公孙开启浙江叙事,故在此埋下伏笔。而牛布衣虽为浙江人,但其作用是从浙江过渡到南直隶板块。陈和甫则本身就是江西人,其对王惠的判词后来一一应验。所以此次重返山东叙事,是开启了此后十余回的情节,这在空间叙事中亦是少见。

之后王惠补缺南昌知府,进入江西叙事板块。王惠与蘧景玉谈交接之事,借蘧景玉之口讲述南昌的风土人情:

“南昌人情,鄙野有余,巧诈不足。若说地方出产及词讼之事,家君在此,准的词讼甚少,若非纲常伦纪大事,其余户婚田土,都批到县里去,务在安辑,与民休息。”<sup>[1]105</sup>

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对江西文化的态度,那时南昌民风较为淳朴,折射出当时江西的经济文化水平并不发达,蘧太守在任期间还在奉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因宁王作乱,“江西第一个能员”王惠调任南赣道,但是不幸做了贰臣,最后逃至浙江乌镇,浙江叙事开始。需注意的是,南昌是在山东、广东、江西板块叙事中唯一一次提到省城民风的地方。可以看得出来,以上三个省的叙事结构中,省城的地位并不突出,虽非无关紧要,但只是作为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点而存在。直到进入浙江板块以后,这种情况就有了明显的改观。

浙江板块从第八回王惠与蘧公孙见面开始,到二十回匡超人离开杭州遇牛布衣结束,足足十二回的篇幅。在整部书的地域叙事中篇幅仅次于南直隶,可见作者对其重视程度。从第八回到第十四回前半部分,故事始终徘徊于嘉兴与湖州之间,如蘧家祖孙本在嘉兴,又因湖州二娄公子的缘故,与鲁编修一家结因缘,蘧公孙入赘湖州,接着莺脰湖诗会将这一阶段推向高潮,此后借宦成之事再次递到马二先生。马二因仗义疏财而生活拮据,不得不离开湖州文海楼去杭州,事在第十四回,至此叙事进入杭州。马二先生进入杭州后游西湖,作者对西湖的描述非常细致,这也是书中第一次着重描写城市文化景观。马二先生在此遇见洪憨仙和匡超人,继续推动情节发展。匡超人从乐清老家第二次又回到杭州,结实杭州文士,西湖诗会成为这一板块高潮。此后因结识潘三,性

情大变。后因潘三被抓,恐受牵连而去京城。考取教习后第三次回到杭州,此时妻子已死,因已停妻再娶,又返回京城。

可以看出杭州府城虽不占整个叙事空间的绝大部分篇幅,但是一直处于浙江叙事板块中的核心位置。前者嘉兴和湖州均在杭州附近,三者均属杭嘉湖平原。而后宦成去请权勿用,地在萧山,在杭州之南。可以说通过这一个个外围描述,形成了一个包围圈,杭州已经呼之欲出。从马二离开嘉兴文海楼开始,故事的中心一直在杭州,虽然中间匡超人有回乐清穿插其中,但是又多次返回叙事中心。

从山东到广东,再从江西到浙江,作者的叙事在不断强化之中。济南、广州提及不多,但作为连接情节的中转站亦不可或缺,到江西时南昌已有民风之描写。在到浙江板块时,杭州景观描写颇多,也意味着该地文化之繁荣。

## 二、南京的双重政治文化身份及其叙事

第二十回牛布衣与匡超人、冯琢庵分别,从扬州经长江逆流而至芜湖,在这个过程中虽经过南京,却故意避而不谈。紧接着从牛布衣死过渡到牛浦郎,牛浦郎因少年时住在浦口外婆家,故叫此名,这与南京又近了一层。但此后牛浦郎遇见牛玉圃,与其一起去扬州,又略过了南京。后来牛浦郎又被派往苏州找“雪蝦蟆”因设局陷害牛玉圃而被报复,幸得安东黄客人相救,辗转到了安东。绕了一大圈,仍然没有说到南京,而且此时叙事中心偏离南京已经更远。直到第二十四回借戏子鲍文卿救安东知县向鼎,因其为南京人士,借其返乡南京才豁然开朗起来:

这南京乃是太祖皇帝建都的所在,里城门十三,外城门十八,穿城四十里,沿城一转足有一百二十多里。城里几十条大街,几百条小巷,都是人烟凑集,金粉楼台。城里一道河,东水关到西水关足有十里,便是秦淮河。水满的时候,画船箫鼓,昼夜不绝。城里城外,琳宫梵宇,碧瓦朱甍,在六朝时是四百八十寺,到如今何止四千八百寺!……还有那十六楼官妓,新妆袿服,招接四方游客。真乃朝朝寒食,夜夜元宵。<sup>[1]306</sup>

这段描写向我们全景式展现了南京城的空间人文景观,这在之前的叙事中是从未有过的。虽然在马二先生去杭州后借其游玩西湖介绍了西湖的景观,但这毕竟是以马二先生的角度去写的,与南京不能同日而语。<sup>[3]</sup>且对于杭州来讲景观描述

仅集中于西湖一处,而南京则分散于各处。在此后的各回中,秦淮河、三山街、聚宝门、大报恩寺、雨花台、清凉山等一系列南京地标均被提及。

从楔子中王冕看见小星坠向东南角可知作者叙述的核心区域即是东南,论者多已指出。开篇先从山东谈起,在转向极南的广东,又折回江西进而浙江,可以说离核心区域越来越近。直到二十四回鲍文卿回南京,按说此后的叙事应集中于南京城内,但事实并非如此。

鲍文卿回南京后,过继了倪家的第六子,改名鲍廷玺。数年后在南京遇见向鼎,此时他已升任安庆知府。因鲍文卿对其有大恩,故将其父子带在身边,故事有偏离南京,走向安庆板块。一番叙事后因向鼎迁福建漳州道,鲍氏父子也只能回南京。此后几回中借鲍廷玺串起了一干人物,如其亲兄倪廷珠突然出现,他又去苏州寻兄,不料到倪廷珠已死。后又提到季苇萧扬州入赘,鲍廷玺去天长找杜少卿打秋风,借杜少卿举家搬至南京,叙事又回到南京。之后几回,迟衡山、庄绍光、虞育德等人相继登场,直到三十七回祭泰伯祠,全书叙事走向最高潮。

但祭泰伯祠后故事却出人意料地朝反方向发展,先是王惠之子郭孝子突然出现在祭泰伯祠后。郭孝子这一人物出现在祭泰伯祠之后寓意再明显不过,因其与泰伯有相似之处。而与其父对比,一个为贰臣,一个是孝子,形成强烈的反差。之后便安排他去四川寻亲,且路过陕西。此处又是作者之精心安排,去四川如果算直线距离则不应路过陕西,但走长江水路逆流而上显然不现实,而走陆路入川在古代亦是艰难。故从陕西绕道越秦岭走蜀道在当时来说确是顺路,即便在当下这也是许多人选择的入川线路。虽路途艰难,但郭孝子有惊无险到了成都,王惠却不见他。后因老和尚事认识萧云仙,故事又递入萧云仙父子。

郭孝子一事,看似颇为蹊跷,实则前后照应。王惠是全书关键人物,前虽说其出家,但最后归宿未交代。因其身份不得不改姓,连籍贯也改成湖广,这也算是对江西板块的回顾。萧云仙立功后反被罚,赖人相助升应天府江淮卫守备。在辗转半个中国之后,故事又回到了南京。再后来又又有沈琼枝嫁往扬州史,汤镇台贵州平苗乱,余特余持兄弟、王玉辉、凤四老爹、陈木南等人相继出场。总之,在最后几回叙事中空间仍在漂移,并未固定在南京,直到最后四位南京市井奇人结束。

后半部分叙事虽以南京为主,但却不集中于一地,尤其两次游离至更偏远的陕西、四川和贵州,这也是众多学者不解的地方。如叶楚炎先生就认为全书空间结构应该是严格的从边缘到中心的叙事模式,在进入南京以后就不应该再游离出去。<sup>[4]</sup>笔者却认为这是吴敬梓的刻意为之,这就要提到南京的双重政治文化身份。

《儒林外史》虽然其在前半部分把主要的叙述空间集中在南京一地,但期间空间流动不断,上文已详细分析其空间流动的路线。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在吴敬梓的眼里南京至少有两重文化地理意象,一个是明代南直隶的中心,二是整个中国的文化中心。

对于第一点,不难理解。因为作者小说叙事假托明代,就不以作者所在的清代政区设置为限。且江南分省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直到作者所在的雍正与乾隆时期尚未完全分开,故其对区域文化的影响也微乎其微,本文不欲探讨。<sup>[5]</sup>明清两代二级、三级政区设置变动并不是很大,在小说所集中叙述的东南一带,只有高层政区有变化,即从南直隶分为江苏和安徽二省。无论明清,南京都可以作为东南的政治文化中心,且是唯一的政治中心,这是毋庸置疑的。而明朝南京又是陪都,所以其政治地位仅次于北京,在明人眼中,称南京就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南直隶应天府,二是指明朝的陪都。

明白了南京的双重政治文化身份,就不难理解后半段的叙事为何总是从聚焦到离散,再到聚焦这样一个过程。具体言之,从牛布衣算起,南直隶板块开始。这时的叙述模式跟浙江板块如出一辙,先讲外围,再慢慢进入中心。就连杭州与南京的开场方式都雷同,只是一个是从马纯上的角度叙述西湖,一个是作者的角度叙述南京。但是到后来,作为南直隶中心的南京逐渐退场,转而进入全国文化中心的叙述模式。这样就有了祭泰伯祠的八方汇聚,这从主祭的常熟人虞育德,亚献的南京人庄绍光和三献的浙江处州人马纯上可以看出地域的广泛性,更别说其他各类人士。正是全国文化中心的这一设定,才会出现如此盛况。

在这一高潮过后,紧接着就是郭孝子和萧云仙二人出场,将西北和西南的两个省份——陕西和四川纳入叙述空间范围。前者在祭泰伯祠后出现在南京,后者到江淮任职又路过南京,再次突出南京的中心地位。此后沈琼枝一介女流而在南京

写诗,更是给南京的文化内涵增添了一个维度。最后几回,虞育德去浙江,杜少卿相送,时贤相继凋零,南京叙事也走向尾声。

可以说,小说的地域叙事虽然从山东——广东——江西过渡到浙江,再到南直隶周边,最后集中于南京,但是并非完全聚焦,而是有所转移。笔者认为这也是全书最大的地域叙事特点,即聚焦——离散——再聚焦的圈层结构。

### 三、文化地理视野下的圈层结构

当代文化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文化区、文化扩散、文化生态、文化整合与文化景观五个方面,这一点在《儒林外史》中都可以找到影子。

作者每一个板块的叙事,都可以看作一个文化区。如山东是鲁文化区,广东是粤文化区,江西是赣文化区,浙江和南直隶则属于江南文化区。南京的二重政治文化中心身份,即是其文化扩散的动源。全书的文化扩散是单方向的,主要是以南京为中心,向四周扩散。浙江由于离文化中心最近,所以文化水平上也仅次于南直隶。而其他边缘省份如陕西和四川,只能是向南京这个文化中心聚拢。而书中对各地风土人情的描写则表现出不同的文化生态,大抵江南地区的文化生态层级最高,而边缘省份文化生态自然化趋向明显。

就文化整合来讲,明清时期最大的文化整合动力在于科举制。科举制到明清时代已经完全定型,八股取士成了当时科举的代名词。国家通过科举制实现对地方文化的控制,而乡绅在其中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大多是科举制下的成功者,《儒林外史》中的乡绅形象比比皆是。而官员的避籍制度又促进了人才的地域流动,胥吏、幕僚也兴盛起来。<sup>[6]329</sup>这在书中也是推动地域板块转换的一大动力。如高要知县汤奉是南直隶仪征人,其弟汤奏汤镇台又去贵州为将。尤扶徕是南京人却在陕西同官任知县,萧云仙是四川人来应天府江淮卫任职。安东前任知县董瑛与后任知县向鼎都是浙江人,向鼎后又去四川任职,再回到南直隶安庆府,最后去了福建。种种描述都可以看出科举制下广泛的地域流动,这也是文化整合的最大动力。

文化景观是作者着重描写的部分。前文已述,杭州与南京的城市文化景观是作者最为熟悉的,描写也甚是详细。除此以外,湖畔文化景观也值得注意,楔子中王冕就在湖畔进行绘画,后面莺脰湖、西湖和莫愁湖三次文人聚会都选择在湖边,

也是作者刻意造就的文化景观。莺脰湖处于吴越之间,更是显示了江浙文化的水乳交融。<sup>[7]</sup>

通过以上文化地理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条线索,那就是叙事板块的中心化程度越来越高。从开始的山东、广东板块,几乎看不出有中心的存在。济南和广州无疑都是地方政治中心,但文化中心的存在感不强。江西板块的南昌府城,才借蘧景玉之口三言两语地描述其风土人情。而到了浙江板块,杭州在整个省内的中心地位是毋庸置疑的。此处虽涉及浙江全省大部分府一级政区,或为人物出场籍贯,如马纯上之处州;或为现实描写,如匡超人之温州乐清,但无疑杭州着墨是最多的,西湖文化与自然景观描写也极为详细,这在此前从未出现过。而到了南直隶板块,南京的地位则更为突出,作者对其情感流露跃然纸上。而南京的双重政治文化身份则为后期的不断聚焦和离散做了注解。

美国学者施坚雅曾经提出过著名的“施坚雅模式”,其理论是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中心地理论基础上所做的修正,主要研究中国在帝国晚期时代的城市—乡村市场层级。这一理论在经济史领域被广泛应用,因其预设是一个相对均质的平原地带而收到质疑,中国学者对其也有一些修正。除去经济领域,笔者认为借用其理论分析文化地理现象也未尝不可,而《儒林外史》所展现的科举制下特殊的圈层结构正好适用。

通观整个《儒林外史》,作者所叙述的空间在不断的变化之中,杨义先生就说过《儒林外史》叙事没有三回以上不换地点的<sup>[3]</sup>,这一特点就为广阔的空间分析提供了有利条件。我认为《儒林外史》的圈层结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文化的地域差异导致的圈层结构。文化本身没有优劣之分,但是在不同区域却有先进和落后之分。吴敬梓对各地人物的态度可以看出对其地文化的认知。从开始的山东、广东与江西叙事,基本以反面人物为主,作者对他们多持否定态度,而到了浙江、南直隶板块,持肯定态度之人物越来越多。而全书最正面的两大人物虞育德和庄绍光都是南直隶人,不得不说这是作者的地域偏爱。而祭泰伯祠将这种文化圈层推向极致,南京无疑是此圈层的核心。

其次,人物分布的密度上,也可以看出其圈层。一方面是浙江和南直隶板块涉及的人物明显偏多。另外一个方面,最偏远的陕西、四川等地没

有涉及几个人物,而且其人大都与科举、诗文无关。陕西板块只有一个木耐最后进入幽榜,这也和当时的现实相照应。而四川板块萧云仙是个武将,而后汤镇台在贵州立功却不得见用,又回到仪征,也是圈层的一个回流。

第三,从描述文学活动的地点来看,也是集中在浙江和南直隶。文中几次诗会,无论是莺脰湖、西湖还是莫愁湖,莫不在江南地区。而作为全书高潮的祭泰伯祠自然是放在全书的核心南京。其他地域没有叙述文学活动,也没有科举之士和诗文之士的争论,当然也只有文化圈层的中心才可能出现。

#### 四、地域圈层结构的深层表达机制

英国地理学家迈克·克朗在《文化地理学》中讲道:“在文学作品中特定的空间与空间的界限是如何确立的,这取决于小说的结构,作者的性格和自传。”<sup>[8]59</sup>上文详细分析了《儒林外史》地域圈层结构,之所以形成特殊的地域叙事,除了南京的双重政治文化身份外,还有一点就是这与全文的主旨相关。近一个世纪以来,大部分学者都把《儒林外史》的主题框在反封建反科举之下,在笔者看来,这绝非作者的全部创作意图。

吴敬梓本人对功名富贵的态度其实是复杂的,他曾经也为因病不能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而懊恼。其创作《儒林外史》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其心境不可能不发生变化。谈凤梁先生就认为其主旨是从“文行出处”转到“礼乐兵农”,由抨击科举到进一步抨击时政。<sup>[9]</sup>全书在第三十三回借迟衡山之口第一次提出了礼乐兵农的主题:

而今读书的朋友,只不过讲个举业,若会做两句诗赋,就算雅极的了,放着经史上礼、乐、兵、农的事,全然不问!我本朝太祖定了天下,大功不差似汤武,却全然不曾制作礼乐!<sup>[1]415-416</sup>

所以才有后面迟衡山提议祭祀泰伯,这自然是礼乐盛典。后笔锋一转,离开江南,由陕西而四川,从郭孝子到萧云仙,突出的是萧云仙的兵农之事。这就是叙事地域更偏向边缘省份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作者看来,兵农之事只有发生在此地才合情合理。这即使不是完全客观,但“文学作品的‘主观性’不是一种缺陷,事实上正是它的‘主观性’言及了地点与空间的社会意义”<sup>[8]45</sup>。后有借汤镇台立功而被迫返乡事,折射了建立事功的不易,借以抨击时政。其实早在鲍文卿板块中,作者已经将事业扩展到传统的儒林以外。在鲍文卿之

前,不管是肯定还是否定,八股之士还是诗文之士,都与儒林有关。但鲍文卿一介戏子,却在德行上超越许多所谓的名士,亦是作者的刻意安排。

后在第三十五回,借嘉靖皇帝之口,印证了当时礼乐的衰败:“只是百姓未尽温饱,士大夫亦未见能行礼乐。”<sup>[1]434</sup>这两句可谓将朝廷骂得体无完肤,百姓既不温饱,士大夫又不行礼乐,那朝廷的教化何在?也从侧面说明了作者对礼乐的关注。其实作者并不反对科举,只是反对八股制下被异化的取士标准,作者认为这一标准将真正的名士排除在外。

礼乐兵农的广阔阶层描写决定了《儒林外史》地域叙事的广阔性,而对南北文化的态度,则进一步加强了作者对南京文化的认同。这一第八回王惠投靠宁王一事中,娄四公子评价到:

宁王此番举动,也与成祖差不多。只是成祖运气好,到而今称圣称神。宁王运气低,就落得个为贼为虏,也要算一件不平的事。<sup>[1]112</sup>

这话如果放在明代,绝对是大逆不道之语,将朱棣靖难与宁王作乱等同视之,明人断不敢言之。在看第九回邹吉甫所说:

在洪武爷手里过日子样样都好,二斗米做酒足有二十斤酒娘子。后来永乐爷掌了江山,不知怎样的事事都改变了,二斗米只做的出十五六斤酒来。<sup>[1]118</sup>

从这两段描述可以窥探作者对南北文化的态度,两处都提到明成祖朱棣,其对南京最大的影响莫过于靖难之役和迁都北京。作者未必对朱棣有政治上的批判倾向,但是确实借迁都之事表达对南京地位下降的不满和对北京的不屑。在作者看来,正是由于朱棣的篡位和迁都,才使得经济文化中心和政治中心分离。但即便如此,南京依然是经济文化中心,尤其是文化中心的地位在全国范围内无法撼动。全书提到北京的地方不少,大多以虚化来处理,只有庄绍光进京朝见皇帝才简要描述了紫禁城的辉煌与森严,这与江南水乡的自然活泼景观迥异。而明朝南北榜案,清朝的分省定额制度这些科举因素,更加加深了作者崇南抑北的态度,也是作者将叙述重点放在南京的更深层次原因。

而吴敬梓的人生经历又注定了《儒林外史》的空间叙事如此广阔。据陈美林先生研究,其幼年生活并不如意,十四岁时随嗣父去赣榆,在赣榆的八年使其大大增长了见闻,直到二十二岁又回到

全椒。在赣榆期间也常常游历四方,尤其是几次来南京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再后来因家庭原因离开全椒举家迁往南京。<sup>[10]</sup>其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寓居南京,故在全书中对南京的描述也是最真切。又因为游历大江南北,造就了其小说中丰富的地域叙事。上文已经提到,除南京外,杭州也是着重描写的地方,可见作者也是去过杭州的。除了城市描写以外,对江南水乡景观的描写也非常之多,尤其是各地之间转换时,以水路为多,而对于陆路交通基本略去不写。对陆路描写最详细的就是郭孝子从陕西到四川一路,书中虽未明说,但走的必是蜀道无疑。作者没有亲历过此地,所述只能依靠文献记载,对作者而言陕西、四川等地都是其感觉文化区,故有学者认为这不是吴敬梓所写,乃后人串入,盖不知吴敬梓对此地不熟悉所致。

关于书中杜少卿的原型即是吴敬梓本人,论者几乎没有疑义。书中杜少卿的经历也确实跟吴敬梓本人有相似之处,但是两人并非高度吻合。冯保善先生认为书中的杜少卿作为一个文学形象,是作者塑造“真儒”理想人格的载体。<sup>[11]</sup>笔者非常赞同此观点,书中的杜少卿活得远比吴敬梓本人潇洒,也就是说吴敬梓其实是希望自己活成杜少卿的模样,只是现实由不得他。第三十六回虞育德的话最能表达吴敬梓对功名富贵的复杂心态:“我又求他荐我,荐我到皇上面前,我又辞了官不做。这便求他荐不是真心,辞官又不是真心。”<sup>[1]446</sup>

## 五、余论

以上分析了《儒林外史》地域叙事的圈层结构及其深层表达机制,都是基于空间维度所得出的结论。而时空叙事又是整部《儒林外史》叙事的两个关键维度,再回到开头,时间叙事与空间叙事是否保持高度一致呢,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有些学者认为儒林外史最后一回儒修名单与幽榜不符合作者的全书的立意,应是后人伪作。从而带来后半段郭孝子、萧云仙、沈琼枝、凤鸣岐等一系列故事均被怀疑是伪作,但是从时间叙事与空间叙事的高度耦合可以看出这确是作者手笔。

上文已分析空间叙事的圈层结构,核心集中于东南。而时间叙事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出是一个圈层,核心是嘉靖年间。嘉靖年间不仅提到的次数最多,而且叙事也最为密集。而在这前后叙事又出现时间上的离散性。像祭泰伯这样重要的

时间节点,虽然只是借庄绍光进京一事侧面介绍,但却是全文时间叙事的核心。第五十五回故事结束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显然跟故事开头楔子中明初洪武年间无法呼应,那么第五十六回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又说明什么呢?那就是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历史正式进入明亡清兴的阶段。故虽明朝仍然存在了近三十年时间,但是万历四十四年已经宣告明王朝统一时代的终结,故作者以此为全书叙事的终点,与楔子遥相呼应。且从成化末年到万历四十四年,嘉靖晚期的泰伯祭祀正好处于两者的中间位置,不得不佩服作者构思之巧妙。

#### [参考文献]

- [1]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2]杜贵晨.儒林外史的“天下”“古今”与“山东”[J].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7(2):67-70.
- [3]杨义.《儒林外史》的时空操作和叙事谋略[J].江淮论坛,1995(1):75-81.
- [4]叶楚炎.地域叙事视角下的《儒林外史》结构——兼论儒林外史的原貌问题[J].明清小说研究,2013(1):102-115.
- [5]段伟.清代江南、湖广、陕甘分省标准的异同[J].中国地方志,2013(4):57-64.
- [6][美]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M].北京:中华书局,2000.
- [7]张伟然,宋可达.从吴地到越地:吴越文化共轭中的湖州[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8(1):21-32.
- [8][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9]谈凤梁.《儒林外史》创作时间、过程新探[J].江海学刊,1984(1):78-85.
- [10]陈美林.试论吴敬梓的生活环境与《儒林外史》的地域特色[J].江苏社会科学,2004(6):177-183.
- [11]冯保善.论《儒林外史》的“自传性”——兼及《红楼梦》“自传说”[J].江淮论坛,2019(3):157-164.

(责任编辑 南山)

(上接第16页)

- [12]周腊生.清代状元谱[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
- [13][明]徐树丕.识小录[M].涵芬楼秘笈景稿本.
- [14][清]王载扬.书陈优事[M]//焦循.剧说.扬州:广陵书社,2008.
- [15][明]张岱.陶庵梦忆[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 [16][清]张潮.虞初新志[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
- [17][清]陆肇域辑,任兆麟纂.虎阜志[M].民国十四年(1925)影印本.
- [18][清]李天馥.容斋千首诗·送洪昉思归里[M]//洪昇年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 [19]清代戏曲史编年[M].成都:巴蜀书社,2008.
- [20]苏州图书馆铅印吴中文献小丛书本《玉巢松年谱》(不分卷),民国二十八年.
- [21][清]黄图珙.雷峰塔自序[M]//蔡毅编.中国古代戏曲序跋汇编.济南:齐鲁书社,1989.
- [22][清]黄图珙.看山阁闲笔自跋[M]//蔡毅编.中国古代戏曲序跋汇编.济南:齐鲁书社,1989.
- [23][清]黄图珙.双痣记序[M]//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 [24]吴新雷.插图本昆曲史编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责任编辑 南山)